

生命体验与当下文学批评空间的重新开创

张 冀*

[摘要] 当下文学批评的失语与批评功能的缺位已然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学院派批评、行业性批评还是媒体化批评,相当程度上暗含学理性匮乏的致命缺陷,以致难以有效进入当下文学现场。当下文学批评只有融合生命体验和主体意识,真正地走向细读式与历史性的研究实践,才能有力获取更契合文本实质、贴近作家精神世界的重新认识,才能有效推进当下文学批评空间的重新开创。这对于文学批评家来说,是一种真正使命,更是一种极大挑战。

[关键词] 文学批评;生命体验;主体意识;文本细读;文学史眼光

众所周知,1980年代是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良性互动、各有千秋的“黄金时代”,目前正为学界精英以“重返八十年代”之名进行经典化的学理论证。进入启蒙自我瓦解的19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走向了众声喧哗,文学批评的失语与批评功能的缺位已然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1993年,《上海文学》在第6期上重磅推出对谈录《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表达对于“文学”与“人文精神”双重失落的忧患意识,由此引发“人文精神大讨论”。二十多年来,重建当代文学的批评生态这一问题被学人一再提及。当下文学批评遭遇诸多质疑,一方面是因为各路批评家的话语狂欢和模式套路让文学批评陷入阐释困境和信任危机这一既成事实,另一方面是有学术良知的专家学者针对“皇帝的新装”式的文学批评进行大力纠偏、寻求突围路径的批判反思。我个人也愿结合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就这一话题尝试发出自己的声音。

一、当下文学批评实践的学理缺失

阿尔贝·蒂博代曾将文学批评分为“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大师的批评”^①三种类型,这对于精细把握当下文学批评现状具有颇为重要的启示意义。在我看来,当下文学批评空间按其实际情况大致分为三大板块:学院派批评、行业性批评、媒体化批评。每一板块各具自身特点,也各有突出问题。

学院派批评,文学批评的第一阵营,主体为普通高校和社科院系统的文学批评专业人士。这一类

*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430079。

① [法]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批评家一般都接受过比较系统的文学教育,大多曾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从常理上说,具备深厚的理论素养、宏阔的文学视野和独到的专业眼光。从当下的批评实践看,也出现过不少具有犀利的文学见解和过人的审美判断分析能力的精品力作,但就整体而言,在学术GDP的表面繁荣之下,大多呈现的却是缺乏对于文学原著的文本细读、淡化对于历史语境的重新体认、迷失在理论推演或材料堆积中以致失却问题意识的特殊图景。人数和资源都占据绝对优势的学院派批评的“病灶”是多元的:一是某些批评主观超越作品自身的文本意义而微言大义,甚至就连文本细节的局部复述也能出现低级错误;二是“洋八股”大行其道,一直采用将西方强势的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直接移植到中国文学的文本批评这一运思策略,又或理论先行、让鲜活的中国文本作为阐释印证西方理论的取样分析,使文学批评蜕变成一种纯粹的技术操作,“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无从谈起;三是缺乏文学史的整体意识,文学批评始终停留在评论而非研究的平面化的粗浅层次,严重割裂了当代文学创作与现代文学、古典文学传统的血缘联系;四是缺乏独立思考,人云亦云,陈词滥调常常散见于各种批评文字中,重量级专家学者的某些悖谬观点亦能具有高引用率而盛传一时;五是缺乏广泛而深入的持续阅读,忙于跑马圈地或以文交友,只“求闻达于诸侯”,和当代作家构建朋友圈,相互借重,互惠互利,当然,这已非学术行为。以上种种表现(包括但不限于),已不能有效进入当下文学现场,总结文学经验教训和文学发展规律,大体上应验了鲁迅先生在1922年就说过的话:“独有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践踏,则我以为委实太滥用了批评的权威。”^②

行业性批评,文学批评的另一正规军,主要包括文联、作协系统相关人士。王蒙、王安忆、韩少功、格非、残雪、阎连科、毕飞宇、苏童等当代作家亦有理论批评的个人抱负,有些接近于蒂博代指称的“大师的批评”,但究其实质,这些作家的批评文字仍属于行业性批评的当然范畴。文联、作协系统的这一类批评家与其前辈同行相比,学历层次明显提升;与学院派批评家相比,文风为之一新,大多变注重学术规范的“学报体”为依一己之阅读体验、醉心于“灵魂在杰作间的冒险”这样即兴、零星的印象式批评。印象式批评是中、西方批评方法之一种,无所谓优劣高下。中国古代就有诗文评的传统,现代也出现过李健吾这样的批评大家,西方则源自唯美主义反理性倾向。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就能发现,当下批评家对作家追踪式、印象式的批评,多有引为同道、共同成长的隐性前提,这自然带来了更易把握作家创作个性和艺术趣味的直接便利,但文学批评的主、客体之间缺乏必要的距离,就容易导致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文学批评既然是一种学术行为,理应如艾略特所说的那样具有学理性:“从事批评,本来是一种冷静的合作活动。批评家,如果是真正名副其实的话,本来就必须努力克服他个人的偏见和癖好——这是每个人都容易犯的毛病——在和同伴们共同追求正确判断的时候,还必须努力使自己的不同观点和最大多数人协调一致。”^③

媒体化批评,文学批评的第三种力量,系普通读者以新媒体为主要传播渠道的随性点评。与学院派批评、行业性批评圈内人自说自话不同的是,媒体化批评是文学圈外人将因人而异的模糊感受诉诸文字与人分享、交互传播,但往往是围绕作品文本的读后感式的表浅议论,缺乏理论的支撑和文学史的整体观照,有时甚至还缺乏起码的人文常识。这一类批评,虽偶见才情,却难以将其平面化的分析言说升华成为真知灼见,是被排除在学术评价体系之外的。

当代文学批评空间三分天下并非各成独立王国,一定条件下还能归于一统。高建平先生言及“目

①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②鲁迅:《热风·对于批评家的希望》,《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23页。

③[英]T.S.艾略特:《批评的功能》,《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卞之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15页。

前最具社会关注度的批评”时提出“推介性批评”、“扶植性批评”、“酷评”这三种“非学院的逻辑在发挥作用”^①的批评方式。无论出版机构支配的助推图书营销的推介性批评还是文艺机构组织的力挺作家上位的扶植性批评,多半都有着经费投入、项目支持、媒体炒作的运行机制,学院派批评、行业性批评参与其间,实属非学理性的行为艺术。以作品研讨会或作家研讨会为例,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稳步推进,中国正在逐步走入靠制度或契约维系的陌生人社会,但熟人社会的关系垄断和人情纠葛的圈子特征依然存在。如此大气候下,批评家在研讨会这样的小环境中难免是“识时务”的“俊杰”,而非“不识时务”的“圣贤”,几乎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判断和批评的大气与锋芒。有学者对文学批评的趋时与媚俗痛心疾首:“文学批评家的出场变得比文学批评家的批评本身还重要”,“文学批评要有独到的见解,是创造性的劳动,而不是赶场、随份子、唱堂会。”^②至于媒体主导的“酷评”,有时也并不全是媒体化批评在冲锋陷阵,其间也有学院派批评、行业性批评的暧昧身影。

面对当下学院派批评、行业性批评、媒体化批评在场却缺席的乱象和学理性缺失,颇多研究者将其归因于体制和市场的影响制约。这是仅从外部因素着眼的皮相之见,我们理应从文学批评自身找寻深层原因。别林斯基曾就其历史审美批评说:“用不着把批评分门别类,最好是只承认一种批评,把表现在艺术中的那个现实所赖以形成的一切因素和一切方面都交给它去处理。不涉及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以及反之,不涉及历史的美学的批评,都将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批判应该只有一个,它的多方面的看法应该渊源于同一个源泉,同一个体系,同一个对艺术的观照。”^③在我看来,依靠形而下的生命体验,而非生硬的形而上的理论阐释,亦能有效观照“表现在艺术中的那个现实所赖以形成的一切因素和一切方面”,从而走进作家真实的精神世界。

二、生命体验观照与主体意识张扬

在当下,谈生命体验或许是一个“测不准”的魔幻话题。如前所述,不少批评家会主动规避生命体验的言说风险而凡言必称理论,经常自娱自乐般援引各种西方文论观念去套话连篇地解读文本、阐释作家,造成了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无疑是文学审美的巨大悲哀!作家之所以为作家,首先是因其文学创作,而非文论素养抑或哲理思辨这些文本之外的东西。所以,在生命体验面前,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我相信,这一看似偏至之论定会招致广泛质疑,但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何谓生命体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而这种面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诸种关系的经验是感性的、认知性的,属于认识论范畴。当个体生命为了找寻理解世界和自我认同的合适途径、力求消除各种知识话语的蒙蔽或误导、转向对自身生存状态更具活力更为自觉的领悟探索时,就激活了灵魂深处的生命体验。生命体验是个体生命不可或缺的独特感受,也是一种尚未形成理性认识、有人性深度的情感积淀。于文学创作而言,生命体验只有经过作家“入乎其内”的自我沉潜,才能“出乎其外”上升为自我超越的审美经验。作家从事文学创作,无非是其经验叙事,即便是个人想象力满血复活的虚构叙事,也同样是源自作家本人的生命体验,这不仅是作家创作的叙事动因,还直接彰显其心路历程。原因在于,文学是人学;文学史是人的精神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④。文学创作也是白日梦,梦所使用的象征性

①高建平:《论学院批评的价值和存在问题》,《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1期。

②高玉:《文学批评的操守与格局》,《文艺争鸣》,2014年第2期。

③[俄]别林斯基:《关于批评的讲话》,《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满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595页。

④[丹麦]格奥尔格·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1卷,张道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引言第1页。

语言,“是一种代表感觉经验的语言,是表现我们内在经验的语言,……(省略号为引者所加)是我们灵魂与心灵象征的语言”^①。这和古典文学的生命意识有些类似,但现代中国文学的生命体验有了全新的理论参照,比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说、尼采的酒神精神学说、厨川白村的苦闷象征说等等。对于文学批评而言,同样也有“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循环往复过程。批评家面对鲜活的作品文本时,以个人的生命体验为切入点,与作家的生命体验形成情感共鸣,就是人之常情的“同情之理解”;在此基础上完成对历史真实、艺术真实等话题带有体温的个性思考,得出更契合文本实质、贴近作家精神世界的重新认识,这是文学批评的独特魅力所在。

近些年来,学界一直都在强调语境意识,更为看重当下眼光。但韦勒克、沃伦在其《文学理论》中曾说,“历史派的学者不会满足于仅用我们这个时代的观点去评判一件艺术品,但是这种评判却是一般文学批评家的特权;一般的文学批评家都要根据今天的文学风格或文学运动的要求,来重新评估过去的作品。对历史派的学者来说,如果能从第三时代的观点——既不是他的时代的,也不是原作者的时代观点——去看待一件艺术品,或去纵观历来对这一作品的解释和批评,以此作为探求他的全部意义的途径,将是十分有益的。”^②如果我们据此进一步引申的话,生命体验就是穿越时空的“第三时代的观点”,直抵作品文本内核。当下文学批评的真正危机并不在于理论自身的概念或逻辑出现问题,而是在于没有回到文学自身、超越生命体验的他者言说所引发的结构性危机。对此,我们需要一种反思性思维或说是批判性思维。

要保持生命体验的批评状态,需要最大限度发挥批评家和批评的主体性。只有这样,才能深刻揭示批评对象的立体性、多面性和文学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回望中国当代批评史,1985年以来,“文学主体性”和“文学本体论”话语强势崛起。《文学评论》从1985年第4期起开辟“我的文学观”专栏,其中,鲁枢元从“本体论:物理世界与心理世界”、“创作论:模仿自然与表现心灵”、“价值论:干预生活与干预灵魂”三个维度来宣讲他“用心理学的眼光看文学”的文学观念^③;孙绍振认定“情感自由的程度决定创造力的大小,感受力大于观察力是作家获得内在自由的首要条件”^④;刘心武则呼吁“我们亟需向文学内部即文学自身挺进,去探索文学内部的规律,或者换个说法,就是去探讨文学的本性”^⑤;王蒙召唤“我们更应该重视对文学的本体论的研究”^⑥。最值得提及的是《文学评论》连载、被称作“我们时代的文艺理论”^⑦——刘再复先生的《论文学的主体性》。这篇系统阐发文学主体性问题的长文认为批评家主体性的实现须经过三级超越:一是与一般鉴赏者一样,必须超越现实意识,把自己升华到审美境界;二是充分理解作家的同时超越作家的意识范围,发现作家未意识到的作品的价值水平及作品的潜在意义,以独特的审美理想进行审美再创造;三是在批评实践中,通过“同化”和“顺应”机能,超越自身的固有意识而实现批评主体结构的变革即实现自身的再创造;经过此超越,批评从科学境界升华到艺术境界^⑧。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思想资源是康德主体性哲学及李泽厚先生的主体性和人类学本体论,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钱谷融先生的“文学是人学”理论一脉相承。这从主体本身转向对主体存在状态的研究思路,突出表达了文学自律性和审美性渴望摆脱当代文学前三十年只强调对客观实体的反映、忽视作为主体的人的审美心理的机械反映论和政治决定论他律束缚的急切吁求,在当时产生极大影响。1980年代后期,在刘再复黯然淡出中国学界、思想文化语境多元化、后

① [德]弗洛姆:《梦的精神分析》,叶颂寿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8页。

② [美]勒内·韦勒克、[美]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36—37页。

③ 鲁枢元:《用心理学的眼光看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

④ 孙绍振:《形象的三维结构和作家的内在自由》,《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

⑤ 刘心武:《关于文学本性的思考》,《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

⑥ 王蒙:《读评论文章偶记》,《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⑦ 林兴宅:《我们时代的文艺理论——评刘再复近著兼与陈涌商榷》,《读书》,1986年第12期、1987年第1期。

⑧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续),《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现代思潮兴起等多重因素下,文学主体性理论迅速被边缘化。进入21世纪后,“文学主体性”理论转向了主体间性。无论中国主体性的理论与实践在本土与西方之间如何调整变化,主体意识张扬总是当下文学批评的必备态度。

三、文学批评空间重建的有效路径

丁帆先生面对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生态曾不无理想地表示,“批评的最高阶段是既有艺术感悟的灵性,又兼备历史批判的责任。”^①其实,他所期待的不过是常识,却要冠以“最高阶段”,可见当下批评空间的重新开创任重而道远。对于批评家而言,当下文学批评若要“接地”和“走心”的话,就必须在生命体验和主体意识强力牵引下经由两个基本途径:文本细读,文学史眼光。只有同时具备了文本细读和文学史眼光的文学批评,才是合格的文学批评,才是有效的文学批评。

回到文学本身,摆脱观念迷恋造成的先入之见,将作品文本看作独立而自为的精神世界,在文本细读中去还原揭示作家真正的创作动机及其艺术内涵,这已是文学研究界的广泛共识。但沿袭多年的观念性批判积习、加之文化研究兴起的巨大冲击,当下文学批评更多的还是文本细读遮蔽之下空泛的、“短平快”的观念性批评。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一直未能完成文本细读的补课任务”^②。不妨以文学史家钱理群先生的鲁迅研究为例,来参看生命体验和文本细读如何实现有机结合。钱理群通过审视自我及一代人去深入把握鲁迅清醒的批判意识和饱满的忧患意识,在此基础上,审视鲁迅心灵的悖论性困境,由历史文化的思考上升到形而上的人类学思考。他指出:“当我们选定文学史研究的目标是在发现与揭示特定历史时代人的生存境遇、体验与困惑,描述人的生命涌动轨迹时,我们就已经赋予‘典型文学现象’与‘历史细节’在文学史描述中的特殊意义与价值。”^③毫无疑问,钱理群确立了“典型现象”的本体论地位。为实现研究目的,他总结出个性化的研究路线:“从作家在作品中惯用的、反复出现的词语入手,找出作家独特的单位意象、单位观念(包括范畴);然后,对单位意象、单位观念进行深入的多层次的开掘,揭示其内在的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美学等的丰富内涵,并挖掘出其中所积淀的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多种因子,以达到对作家与古今中外广大世界息息相通的独特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具体把握。”^④钱理群把困境看成是历史中的人的某种本体,通过作为典型文学现象的“单位意象、单位观念”以及历史细节揭示了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人基于生存境遇、生命体验产生的现代性困惑、焦虑与质疑。这种感悟与阐释的艺术自觉,不仅使鲁迅的个性形象更为丰满,也为鲁迅研究提供了不断突破的可能性。对于当下文学批评而言,亦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

在文学研究界,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元合一也是一大共识。文学理论不包括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文学批评规避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文学史缺乏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都难以想象。艾略特就表示:“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谁也不能单独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他和以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把他单独评价;你得把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批评原则,也是一个美学的批评原则。”^⑤故而,文学史眼光是考量当下文学批评是否具有学理性的核心指标。我注意到目前学界的一个特殊现象,但凡是现代文学研究出身的专家学者,转向或部分转向当代文学批评时,文学史眼光是标准配置,批评文字中都明显存在文学史的框架背景。例如宋剑华教授曾著文探讨“阅读记忆”的敏感问题:“作家真实生活经

①丁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生态及批评观念与方法考释》,《文艺研究》,2015年第10期。

②陈晓明:《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6期。

③钱理群:《我这十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3期。

④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引言第9页。

⑤[英]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卞之琳等译,第3页。

历所产生的情绪‘记忆’，是作家本人从事文学创作的直接动力与宝贵资源，但作家凭借‘阅读’他者文本而形成的情绪‘记忆’，是否可以作为自身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直接转化为自己创作的精神资源”^①？这一提问很有挑战性，作家将自己的阅读体验巧妙地串接组合进自己的创作实践，首先就面临到底如何认定的关键难题。由于可被理解的特殊原因，要从阅读史、创作经验谈之类文字中去发掘作家之间精神往来的实证材料简直没有任何可能。温儒敏先生谈及文学传统对于后来文学的影响时认为“这种联系千丝万缕，但真的要找到影响的‘桥梁’又比较困难。……一种传统是很难在文本的细节中去寻找的，大多数情形下，那只能是一种精神，一种‘幽灵化’的神气”，只能在“精神”和“文本的相似性”上去寻求和确认两者之间的联系^②。事实上，宋剑华用的就是文本互证方法，从“局部细节的‘记忆’模仿”、“故事整体的‘记忆’模仿”、“复合文体的‘记忆’模仿”，分别对杨沫的《青春之歌》、茹志鹃的《百合花》、陈忠实的《白鹿原》这些业已完成经典化论证的小说文本重新进行解读^③。这种文学史的宏阔眼光和精道细微的问题意识，足资当下文学批评家借镜。

“批评是人类心灵路程上的指路牌。批评沿路种植了树篱，点燃了火把。批评披荆斩棘，开辟新路。因为，正是批评撼动了山岳——撼动了信仰权威的山岳，偏见的山岳，毫无思想的权力的山岳，死气沉沉的传统的山岳。”^④当下文学批评只有融合生命体验和主体意识，真正地走向细读式与历史性的研究实践，才有可能走出一条勃兰兑斯意指的“撼动了山岳”的“新路”。这并非不合时宜的旧调重弹。对于当下文学批评家来说，是一种真正使命，更是一种极大挑战。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当下文学批评空间由此得以重新开创。

（责任编辑：邓晓东）

Life Experie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Space for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ZHANG Ji

Abstract: It is an indisputable fact that literary criticism cannot make its voice heard and its function fel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hether it is done by scholars from the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or by professionals from the literary industry or by the critics from the mass media,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to a large extent shows a lack of rationality, thus failing to b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scene. Only by integrating life experience with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through the close-reading of literacy texts and putting the text into correct historical context when making interpretations can a fresh recogni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which is more in line with textual essence and closer to writers' spiritual world, be achieved and new birth of literary criticism be effectively promoted. For literary critics, what has been mentioned above is not only a real mission but more importantly a great challenge.

Key words: literary criticism; life experience; subject consciousness; close reading;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history

①宋剑华：“‘阅读记忆’能否直接作为文学创作的精神资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5日第7版。

②温儒敏：《现代文学传统及其当代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2期。

③参见宋剑华的《〈青春之歌〉的再论证》（《小说评论》2008年第5期）、《经典的模仿：〈百合花〉与〈红棉袄〉之对比分析》（《南方文坛》2009年第1期）等论文。

④[丹麦]格奥尔格·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5卷，李宗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83页。